

禅宗祖庭“青原”山名和初期禅易关系探究

习 罡 华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8)

摘要:对于禅宗与《周易》的关系,前人多追溯到云岩昙晟的《宝镜三昧》,云岩昙晟是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的三世法孙。禅易关系其实还可以上溯到青原行思,多种资料表明,青原行思乃禅易关系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本文通过行思道场“青原”山名之考辨,证明行思道场在他本人时代由安隐山更名为青原山,这其中具有深厚的易学背景,进而揭示淹没于历史长河中的初期禅易关系,不仅可以为研究早期禅宗的发生打开新局面,也可以为研究魏晋隋唐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青原行思;《周易》;青原山名;禅易关系

中图分类号:B2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9)05-0098-10

著名学者吕澂有云:“中国的儒道传统思想本来是由玄学沟通的,禅学趋向于玄学,因而它也有沟通儒道的意义。唐人讲的玄学内容仍不出于三玄,而且分开来讲,称《易经》为‘真玄’,《老子》为‘虚玄’,《庄子》为‘谈玄’。禅学后期显然受着玄学这些影响而和从前有所不同。以他们与‘真玄’的关系来看,曹洞宗自曹山之后,即传授洞山五位与宝镜三昧。”^①禅宗与《周易》之关系非由洞山良价新创,他的师父云岩昙晟所传《宝镜三昧》曰:“重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②这两句话在以前被认为是禅宗易学的基础^③,但禅宗与真玄《周易》的关系,其实还可以再往前追溯到青原行思。

青原行思俗姓刘,现吉安市安福县人,是六祖慧能的大弟子,禅宗青原系或说青原禅系的创始人,南禅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的源头,被尊为“禅宗七祖”。由于记载青原行思行状的数块碑铭很早之前已被毁灭,导致他的生平业绩隐而不彰。但有多种资料表明,青原行思具有深厚的易学修养,乃禅易关系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地名被认为是历史的活化石,往往蕴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成为解读历史谜案的密码。青原行思的道场青原山之名,即隐藏着初期禅易结合的历史。本文就青原山名之易学意蕴试作剖析,聊抒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收稿日期:2019-05-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013年青年项目:“禅宗七祖青原行思和青原禅风研究”(13CZS068)

作者简介:习罡华(1975—),男,江西吉安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禅宗史。

①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2826页。

② [宋]普寂撰,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784页。

③ 参见陈荣波《易经离卦与曹洞禅》,载《华岗佛学学报》第4期,第224—244页;陈坚《重离六爻,偏正回互——曹洞宗禅学的易学基础》,载《周易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23页。

一、唐代颜真卿之题名

清代黎元宽《青原志略序》说：“青原始终为佛窟焉已矣。此山自李唐以前未显，及思祖居之，乃有名于时。”^①青原山在唐代以前不大为人所知，只是由于禅宗七祖行思从六祖慧能门下得法后，回吉安在此弘扬顿悟禅法，才逐渐为人所知。

《青原志略》卷一《山水道场》“青原安隐山”条说：“青原盘亘数十里，以七祖道场而名。”同卷“安隐净居寺”条说：“唐神龙初，寺名安隐。开元间，七祖行思禅师得法六祖，扬化青原。”（《青原志略》，第20页）由此可知，在行思到达之前，其驻锡地名安隐山，当时已有始建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的兰若，随着他的到来才改名青原山。

唐代颜真卿《靖居寺题名》说：“唐永泰二年（766），真卿以罪佐吉州。闻青原靖居寺有幽绝之致，御史韩公涉、刺史梁公乘尝见招，欲同游而不果。大历二年（767）十月……登礼焉，因睹行思天师经始双泉之灵迹，道契律师纂成口路之秘藏。徘徊瞻仰，乃援翰而勒于碑阴。”^②青原行思生于673年，卒于740年。《靖居寺题名》证明，行思驻锡地的确在他本人时代即已更名为“青原山”，且颜真卿对青原行思极为尊敬钦佩。

“安隐山”改名为“青原山”，或许是行思本人所为；或许是行思去世后，由朝廷敕封；或许是行思改定之后，再得到朝廷的确认——据《五灯会元》青原行思本录的内容来看，第三种情况极为可能。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引出一个新问题，行思驻锡山名改为“青原”的意蕴何在？

东汉刘熙《释名·释采帛》说：“青，生也，象物之生时色也。”^③青指植物生长时的颜色，即一般所说的绿色。

“原”是会意字，金文中的原字像泉水从石头下流出；篆文写作“原”，由厂和泉会意。原的本意是指水流的起始处，后用“源”表此意。由水源引申指开始的、最初的，又引申出原来、本来，推究、宽恕、赦免的意思。《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可食者曰原（可种谷给食）。”^④

清康熙江西通志《西江志》卷第九“青原山”条说：“在府城东南十五里，山势郁盘，外望如蔽，旁有径萦磴而入……狮象二山，左右拱立。骆驼、鹧鸪岭巘峒络绎，盖天然胜区也。”^⑤青原山耸立在赣江之滨，“山势郁盘，外望如蔽”“巘峒络绎”，非“广平”或“种谷”之地，所以其名称当不是“青色平原”或“绿色粮仓”之意，而应另有所指。

据青原行思家乡族谱记载，其家族迁居江西安福县（案：安福古称安成），始于东晋刘遐：“遐仕晋为安成太守。任满，留居安成笏桥，遂家焉，子孙蕃衍，是为笏桥刘氏始祖。”同时又说：“魏夫人，名华存，字贤安……我笏桥派祖安成太守遐之母。”还记载青原行思的祖父刘延说：“延，字延年，安成公十世孙，仕隋为吏部尚书郎……子二：铨、锡……锡子二：行志、行思，行思出家，号弘济禅师。”^⑥据此可知，青原行思是道教上清派创始人魏夫人的十三世孙。周治《南岳夫人魏华存新考》

① [明]方以智编，张永义点校《青原志略》，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2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② [唐]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汉]刘熙《释名》卷四，光绪广雅丛书本。

④ [晋]郭璞注、[宋]邢昺疏、李传书整理《尔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197页。

⑤ [清]白潢等修，查慎行等纂《西江志》，影印清康熙五十九年版，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第156页。

⑥ 《安福龙云刘氏下村六修族谱》，2003年，第44、76、233页。

据南京象山王彬家族墓葬新出土材料与传统文献互考,证明魏夫人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其家族是道教世家,且与琅琊王氏有姻亲关系,她本人确实是道教上清派创始人。^①可见青原行思出身于一个具有深厚易学背景的显赫家族。

宋代道原禅师《景德传灯录》石头希迁本录说:“师著《参同契》一篇,辞旨幽睿,颇有注解大行于世。”^②传统观点多据此认为禅宗《参同契》是石头希迁所撰。五代静、筠二禅师撰《祖堂集》石头希迁本录则说:“师述《参同契》。”^③《论语·述而》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④据此可以推知,禅宗《参同契》实为石头希迁的老师青原行思的作品——该问题比较复杂,宜另外撰文详析。

禅宗《参同契》之名,参同叁亦即三,契乃文、歌之意,“参同契”意思是“三同歌”,其主旨即以《周易》为基础而宣扬儒道佛三教合一。禅宗《参同契》说:“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⑤从大仙、参玄等词汇来看,行思的确具有浓厚的道教和易学色彩。

吕澂先生说:“禅宗《参同契》是借用汉代道家魏伯阳著作的名字。”^⑥魏伯阳《参同契·自叙启后》(案:魏伯阳《参同契》在后世多称《周易参同契》)自道说:“会稽鄙夫……希时安宁,晏然闲居,乃撰斯文。”^⑦会稽即绍兴,魏夫人的长子刘璞曾经为官绍兴,所以魏夫人应该是从这里熟悉《周易参同契》,在此基础上创作了道教上清派经典《黄庭经》。

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说:“《参同契》文章极好……须溪刘氏曰:‘古书惟《参同契》似先秦文。’”^⑧须溪刘氏即宋代庐陵人刘辰翁,须溪是他的别号。刘辰翁《乐丘处士墓志铭》说:“安成,古长沙郡。吾庐陵之刘,未尝不本长沙也……按《唐思禅师塔碑》:‘思,刘氏,长沙定王后,是为七祖。’”^⑨可见刘辰翁是青原行思家族的后人。又《青原志略》说:“天宝六载(747)碑略曰:‘七祖,长沙定王发后。’”(《青原志略》,第159页)长沙定王刘发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六子,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被立为长沙王^⑩,故青原行思是汉景帝的后裔,其家族背景的确非同寻常。

刘辰翁之子刘将孙《巽溪堂记》说:“天地之道,莫妙于成巽。而观巽之理,莫如观水。盖阴阳之所以为神,而造化之所以为征,自在成象之表、方位之外,推之而无不通,揆之而无不有。观于此,而后知周流六虚之所以为易,而后知八卦之相为用。由一卦为八,八而不可以数极者,每如此也。一阴一阳之合,一索而成巽,于位为东南。东南口者,生生之始也。”^⑪全文显示刘将孙有极高的易学造诣。刘辰翁非常推重《周易参同契》,而刘将孙又精通易学,可知其家族直至宋末元初还有重视《周易》的传统。

综上所述,行思与道教和易学有密切关系,青原山名当具有浓厚的易学意蕴。

① 参见周治《南岳夫人魏华存新考》,《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期,第65—71页。

②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永乐北藏》第153册,第602页。

③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等点校《祖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200页。

④ [宋]朱熹《论语集注》述而第七,载《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

⑤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等点校《祖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86—487页。

⑥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5册,第2801页。

⑦ 任法融《周易参同契释义》,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205—206页。

⑧ [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页。

⑨ [宋]刘辰翁《须溪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13页。

⑪ [明]钟彦章、曾子鲁修纂《东昌志》卷之三,江西省博物馆藏明永乐抄本。

二、明代王阳明之揭秘

唐朝颜真卿“徘徊瞻仰”之后,历史上许多名人都到青原山礼拜行思。宋代黄庭坚《次韵周法曹游青原山寺》说:“蝉蜕三百年,至今猿鸟哀。祖印平如水,有句非险崖……石头麟一角,道价直九垓……忆当拥旌旗,千骑相排逐……事如飞鸿去,名与南斗偕。松竹吟高丘,何时更能来……猿鹤一日雅,重来尚徘徊。”^①

《宋史·黄庭坚传》说:“苏轼尝见其诗文,以为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蜀、江西君子以庭坚配轼,故称‘苏黄’。轼为侍从时,举以自代。”^②黄庭坚是与苏轼齐名的大学者,博学多识,且是江西修水县人,曾在吉安为官,熟稔当地历史典故,虽然认识到青原行思“名与南斗偕”“忆当拥旌旗,千骑相排逐”,认为青原禅法“道价直九垓”;但在行思“蝉蜕三百年”后,面对“祖印平如水”,似乎也只能“猿鸟哀鸣”,“重来尚徘徊”,踟躇犹豫而不知所措,从而希望他“何时更能来”。这显示出作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学者,对于理解宗教和哲学之理念似乎存在某种天然的隔阂。

黄庭坚在青原山的慨叹,引起400余年后心学集大成者明人王阳明的共鸣。王阳明《青原山次黄山谷韵》说:“邈矣西方教,流传遍中垓。如何皇极化,反使吾人猜。剥阳幸未绝,生意存枯荄……珍重二三子,兹游非偶来……东峰上烟月,夜景方徘徊。”^③王阳明此行显然是有备而来。虽然依旧“夜景方徘徊”,但作为哲学家和理学家的王阳明,显然比黄庭坚大进一步,更加理解宗教家刘行思,因为他已经触及青原禅法“西方教皇极化”和青原禅法“剥阳”“生意”这两个核心问题。

《尚书·洪范》:“皇极,皇建其有极。”孔颖达疏:“皇,大也;极,中也。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④西方教皇极化的问题,即外来文化中国化的问题。著名学者陈寅恪对该问题有非常精妙的论述:“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⑤青原行思、石头希迁、药山惟俨、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等早期青原禅系宗师,文化造诣高超,对禅宗发展的贡献侧重在文化融合和理论建构方面,《参同契》《草庵歌》《宝镜三昧》《五位旨诀》等著作即其贡献,标志着佛教中国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说: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⑥

这四首诗带有浓厚的禅宗色彩,其中第二首所说“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尤当引人

① [宋]黄庭坚《山谷外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元]脱脱等《宋史》第3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09—13111页。

③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0页。

④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7页。

⑤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页。

⑥ [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90页。

注意。此处“圣门”或兼指孔子和行思之门而言，“参同”当指禅宗《参同契》，意在调和儒佛二教之间的冲突。又江右王门弟子郭子章《荆杏双修引》说：

荆杏双修者何？杏，杏坛也。孔子设教，植于鲁国，故世之诵法孔子者，必曰杏坛。荆，荆树也。思祖说法，植于青原，故世之传宗青原者，必曰荆亭。孔自孔，思自思，鲁自鲁，青原自青原。而曰双修者何？孔子洙泗之教，至陆子静而西江始盛，至王阳明倡良知之传，而吾吉始盛。欧邹二文庄、聂贞襄、罗文恭诸公，率入青原而聚讲焉。达祖西来之派，至六祖始南，至七祖思祖而吾吉始盛。上承漕溪，下开石头，实卜青原而居焉。则青原者，在唐则思祖开基植黄荆，至今千年不槁；在明则阳明倡道继杏坛，至今百年如存。寺曰净居，堂曰五贤，虽然其门户微异，趋操少殊，而无欲无念之旨，与人为善之心，杏与荆一也，七祖与五贤一也。（《青原志略》，第163页）^①

由此可知，王阳明和王门弟子试图基于儒家立场去竭力调和儒佛二教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他们曾经认真研究过青原禅法，故王阳明对行思禅法特质的揭示当为可信。

《周易·剥卦》六三“剥之，无咎”，唐代李鼎祚引荀爽注曰：“众皆剥阳，三独应上，无剥害意，是以无咎。”^②朱熹认为：“众阴方剥阳而己独应之，去其党而从正，无咎之道也。”又《兑卦》九五“孚于剥，有厉”，朱熹解释说：“剥，谓阴能剥阳者也。九五阳刚中正，然当说之时，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阴柔，为说之主，处说之极，能妄说以剥阳者也。”^③剥阳是个易学术语，这表明王阳明认为青原行思禅法与《周易》有密切关系——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虽然长期被隐而不彰。

明人宋仪望说：“盖尝读《易》，至剥、复之际，而有感于吾人此心与气机相为出入。夫以五阴剥阳，天地生生之机几于息矣，一阳来复，天根始见，为临、为泰，孰或引之？孰或遏之？大哉复也，其见天地之心复乎？”^④宋仪望，字望之，号华阳山人，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至大理寺卿。宋仪望师从江右王门中坚同郡大儒聂豹，乃王阳明再传弟子，对《周易》有较为深入的了解，故而在其著述中屡屡引《周易》的义理来阐发自己对阳明致良知学的理解。^⑤宋仪望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又是吉安人，他关于《周易》剥、复二卦的感想，可以证明王阳明的确认为行思禅法具有浓厚的易学底蕴；其中“天地生生之机几于息矣”，意同王阳明所言“生意存枯荄”。

明了行思禅法的上述特点，从易学的角度去理解青原禅学，再反观行思改安隐山名为青原，相对来说就要简单得多。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说：“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⑥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说“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又说“东方木，主春，日甲乙”^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青，从生从丹，东方色也。”^⑧许慎已经套用五行观念来解释青字。青因为是草木之色，而东方属木，故青代表东方，转而具有东方的意思。

据上述研究可以推知，所谓青原，有东方之根本，或推究东方本质的意思。青原二字，究其本质

① 案：吉安有“青原行思倒插荆树”的传说，故传统以“荆亭”表征行思禅学，以与“杏坛”孔子儒学相对应。

② [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朱熹撰，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80页。

④ [明]宋仪望《广德重修复初书院记》，载万历本《华阳馆文集》，第670页。

⑤ 钟治国《易学与良知学的融通——以江右王门后学宋仪望为例》，载《周易研究》2018年第5期，第89页。

⑥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第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295、1312页。

⑧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下。

而言,实际上等同于王阳明所说“邈矣西方教……如何皇极化”;或等同于陈寅恪所言“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①。

三、初期禅易之融冶

青原行思留下来的公案虽然不多,但仍可见其易学色彩的蛛丝马迹,该问题因考证繁琐而宜另外撰文论。此外,还有一些其它资料表明行思道场青原之名含有易学意蕴。

(一)《黄庭经》名之远证

詹石窗认为,魏夫人《黄庭经》书名来自《周易》,因为在易学中“黄”有中央的意思。到魏晋时期,五斗米道才开始重视思神术,《黄庭经》的问世即是一个重要标志。在道门中,《黄庭经》是一部几乎可与《周易参同契》比肩的重要经书。^② 上清派《黄庭经》之要旨,是将人体分为上中下三部,认为人身中有如此多的真神,修道者能恒念经书,守一存真,默念神名,便能六腑安和,五脏生华,长生延年。^③

《黄庭经》与《周易参同契》在思想宗旨上具有密切关系,在内容结构上取法易学也就具备理论气候。首先,书名本身即已打上易学的烙印。《黄庭经》书名之“黄”所代表的内丹理念是以“尚黄”为根基的,而“尚黄”思想在《周易》中即有突出的表现;“庭”字与《周易·艮卦》密切相关。其次,在表达手法与具体内容上,《黄庭经》与易学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通过“存想”将符号象征加以活用,创造出一个多彩多姿的“黄庭”大世界。^④ 青原行思禅宗《参同契》,当经《黄庭经》之桥梁作用,而来源于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行思改驻锡山名安隐为青原,或许受其远世祖母魏夫人命名《黄庭经》启发,故而“青原”二字当有深厚的易学意蕴。

(二)摩诃“震旦”之旁证

“震旦”是梵文 Cīna-sthaṇa 或巴利文 Cīna 的中文翻译,又译作真丹、旃丹、至那、支那等名,通常指中国本部及其相邻的部分地方。震旦一词的翻译来源甚古。《旧唐书·西戎传》“天竺”条说:“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震旦使人至吾国乎?’”^⑤ 因为对于印度等国而言,中国在东方。如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说:“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⑥

宋普润法云编《翻译名义集》卷三“震旦”条说:“或曰真丹、旃丹。琳法师云:‘东方属震,是日出之方,故云震旦。’《华严音义》翻为汉地,此不善华言。《楼炭经》云:‘葱河以东,名为震旦。以日初出,耀于东隅,故得名也。’”^⑦ “东方属震”即根据易学理论而来。震旦国名可以证明,唐代有根据易学方位概念给地方命名的传统,青原山名不是孤例。

① 陈寅恪《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4页。

② 詹石窗《〈黄庭经〉的由来及其与易学的关系》,载《古籍整理研究》2000年第4期,第1页。

③ 牟钟鉴等《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第341—347、362页。

④ 参见詹石窗《〈黄庭经〉的由来及其与易学的关系》,载《古籍整理研究》2000年第4期,第4—5页。

⑤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7页。

⑥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五,载《大正藏》第51册,第894页下。

⑦ [宋]法云《翻译名义集》卷三,载《大正藏》第54册,第1098页中。

(三)周益国公之书证

南宋名臣周必大《闲居录》说:“去(永和)镇七八里,过白沙渡。又五六里至朱陵观,知观朱守常及识王父云。按南唐徐锴开宝四年所作《观记》载:‘旧止名洞岩,隶吉水县……洞有青帝、西灵之精。又有对歟峰、徊岚亭。’又云:‘故老传,先天中谢行仙于此学道,贞元中刺史阎案请立观。’其大略具此。饭罢,登自雨岩,即东洞也,徐锴所谓青帝洞者……顷之,过西洞,锴所谓西灵之精者。”^①周必大是青原山赣江对岸永和镇人,封益国公,谥文忠。周必大致仕之后,回庐陵定居,多在青原山及其周边地区考查游玩,于当地历史掌故极为熟悉,所言当为可信。黎元宽《青原志略序》说:“青原以净居主之是也,而净居之视朱陵如腹与背。朱陵为刺史阎案弃官学道处,仙佛同源,盖可想见。”(《青原志略》,第3页)青原山为吉州的庐陵县和吉水县共享,靖居寺和朱陵观都濒临赣江,地近两县交界处,距离不过数里之遥,可谓近在咫尺,但靖居寺属于庐陵县,朱陵观属于吉水县。先天是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的第一个年号,始于712年八月,终于713年十一月;贞元是唐德宗李适的年号,从785年正月到805年八月。青原行思生于673年,卒于740年。据徐锴《朱陵观记》可知,青原山在行思时期已经有“青帝”、“西灵”之说,可证“青原”含有东方之意。又《史记·乐书》说:“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暉》,冬歌《玄冥》。”^②可见四季配四方,东青相搭,青西相对,由来已久。

此外,青原山附近,还有黄原、西原两个地名。黄原即朱陵观一带,可见其得名与道教有关系。赣江由南而北从中间穿吉安而过,青原山在河东,西原山在河西,这意味着“青原”具有东方之意。

另外,两宋时期,青原山地区是个易学发达之地。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杨万里的《诚斋易传》,都是我国历史上的易学名著。文天祥的父亲文仪,字士表,号革斋;他的老师欧阳守道号巽斋,文集以号命名,著有《易故》^③。革、巽皆为《周易》卦名,又前引文证明他的同学刘辰翁青棘《周易参同契》。这些都说明两宋时期青原山地区流行易学,或为唐代青原易学之遗风流韵。

(四)惟俨、义中之反证

《宋高僧传·药山惟俨传》说:“翱邂逅于俨,顿了本心……著《复性书》上下二篇……其书露而且隐,盖而又彰,其文则《象》《系》《中庸》,隐而不援释教。”^④《象》《系》乃《周易》中的《系辞》和《象传》的并称。赞宁认为李翱著《复性书》受药山惟俨启发,且具有深厚的易学色彩,却讳言曾经受禅宗影响。

唐代唐仲《澧州药山惟俨禅师塔铭并序》说:“师遂陟罗浮,涉清凉;历三峡,游九江。贞元初(785)居澧阳芍药山。”^⑤五代《祖堂集·石头和尚》说:“六祖迁化后,便去清凉山靖居行思和尚处。”^⑥所谓“三峡”当为赣江赣吉段的小三峡,非指长江渝鄂段的大三峡,而“清凉”即是青原山,可见药山惟俨长期在青原山及其周边活动,曾经去拜谒青原祖庭,深受行思及其禅法影响。宋代著名学问僧惠洪觉范说:“《宝镜三昧》,其词要妙,云岩以受洞山,疑药山所作也。”^⑦惠洪怀疑《宝镜三昧》的真正作者是药山惟俨,而非传统所认为的云岩昙晟,据上述考证可知,这种推测的确有道理,

① [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六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178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364、12366页。

④ [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4页。

⑤ [唐]唐仲《澧州药山惟俨禅师塔铭并序》,载《全唐文》第五三六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11页上栏。

⑥ [南唐]静、筠二禅师《祖堂集》,载《禅宗全书》第一册,第503页。案:孙昌武等点校本据《景德传灯录》改“清凉山”为“青原山”。《祖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6页。“清凉”在此具有特殊含义,不违“青原”本意,恐无改动必要,笔者将另外撰文详析。

⑦ [宋]惠洪撰,吕有祥点校《禅林僧宝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页。

而其法裔建立曹洞宗确实由来有自。

《全唐文》卷七九一载《漳州三平大师碑铭并序》说：“讽自吏部侍郎以旁累谪守漳浦，至止二日访之……问曰：‘《周易》经历三圣，皆合天旨神道。注之者以至虚而善应，则以道为称；以不思而元览，则以神为名。达理者也？’”^①漳州三平大师即三平义中禅师。据引文可知，王讽曾与三平义中讨论《周易》。三平义中是大颠宝通禅师的法嗣；大颠宝通和药山惟俨是师兄弟，二人关系密切^②，曾从潮州西山惠照参学，后一同转投石头希迁的门下，都是青原行思的法孙。李翱与药山惟严、王讽与三平义中禅师谈禅论《易》，可见早期青原禅系的确盛行禅易结合之风。

通过药山惟俨和三平义中禅法的《周易》特色，以及他们与青原行思的关系，《宝镜三昧》的易学观念应该是发端于行思“青原”之思想，而青原法系曹洞宗之所以极端重视《周易》尤其是“离卦”的作用，也是滥觞于行思“青原”之思想，这可以反推行青原行思禅法具有深厚的易学色彩。

(五) 耽源、普愿之侧证

《五灯会元》卷第九《仰山慧寂禅师》说：

初谒耽源，已悟玄旨。后参泐山，遂升堂奥。耽源谓师曰：“国师当时传得六代祖师圆相，共九十七个，授与老僧，乃曰：‘吾灭后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弥到来，大兴此教，次第传受，无令断绝。’我今付汝，汝当奉持。”遂将其本过与师。^③

耽源即耽源应真禅师，是南阳慧忠国师的法嗣。敦煌遗书《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国师惠忠和尚”条标注为“法嗣司和尚”，据该文前一条“吉州行司和尚”及其内容可知^④，司和尚即青原行思和尚。仰山慧寂是泐山灵祐的法嗣。惠洪《石门文字禅》卷第九《谢大沔空印禅师惠茶》说：“不知大沔水，何尔小南台？让子鋤斧信，闲禅春露杯。”^⑤大沔水即指泐山灵祐，南台即石头希迁，小南台意指泐山灵祐深受石头希迁的影响。

宋高僧法眼文益在概括南禅各派特色时说“沔仰则方圆默契”^⑥，广为人们接收。如吕澂先生即说：“沔仰以方圆代表理事，圆即理，方即事。仰山未入泐山之前曾在耽源（慧忠门下）处传得九十七种圆相，就是在讲话时用手划一个圆圈，然后在圈中写一个字或画一个图案（如牛或佛），这就是圆中有方。仰山继用圆相来表示理事，所以说，以方圆默契，作为他们的门风。”^⑦

又《祖堂集》卷十六《南泉和尚》、卷十八《赵州和尚》说：

问：“祖祖相传，合传何法？”师云：“一二三四五。”……赵州在楼上打水，师从下过，赵州以手攀栏悬脚，云：“乞师相救。”师踏道上云：“一二三四五。”赵州云：“谢师指示。”

师为沙弥，扶南泉上胡梯，问：“古人以三道宝阶接人，未审和尚如何接？”南泉乃登梯云：“一二三四五。”^⑧

南泉普愿所谓“一二三四五”，与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的“五位诀”应该具有相同性，前者是后者

① [唐]王讽《漳州三平大师碑铭并序》，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4部第2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479—9480页。

② 参见罗香林《唐释大颠考》，载《唐代文化史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7—70页。

③ [宋]普寂撰，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27页。

④ [五代]招庆省登《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等合编《英藏敦煌文献》第3卷第1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⑤ [宋]释惠洪撰，[日]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等点校《注石门文字禅》，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640页。

⑥ [五代]法眼文益《宗门十规论》，载《禅宗全书》第三十二册，第5页上。

⑦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5册，第2812页。

⑧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孙昌武等点校《祖堂集》，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08—710、793页。

的通俗简化版。《周易·系辞》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①吕澂先生认为,曹洞宗五位中偏正回互就是联系《周易》而说:“如离六爻,偏正回互,叠而为三,变尽成五”。五位的变化与卦的变化道理一样,卦是六爻,而只能有五位。^②《周易》每卦六爻五变,南泉普愿、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的五,即来自于《周易》一卦六爻五变。

又唐代权德舆《唐故章敬寺百岩大师碑铭并序》说:“禅宗长老百岩大师之师,曰大寂禅师……荐绅先生知道入理者多游焉。尝试言之,以《中庸》之自诚而明,以尽万物之性,以《大易》之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则方袍褰衣,其极致一也。”^③百岩大师即章敬怀晖,大寂禅师即马祖道一,《大易》即《周易》。由权德舆的铭文序言可知,马祖道一门下也有重视《周易》的传统。

惠洪觉范在《吉州禾山寺记》中说:“曹溪之门得道者不可以数计,然独大长老行思、怀让克肖前懿,号二甘露门。思眷庐陵山水而老于青原,让亦庵于衡、霍之下。石头希迁者,思高弟也,从让游,思实使之;马祖道一者,受让记莚,卜邻青原久之,遂终于石门,让实使之。”^④惠洪觉范学识渊博,见地独到,他对青原行思、南岳怀让、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之间关系的论述,当为可信。又清初名僧笑峰大然说:“卜邻青原何地乎?俗传马祖从张渡过兴国、宝华、宝峰,往来孰多由此。迁从让游,思实使之;卜邻青原,让实使之。寂音表出,古风俨然哉!”(《青原志略》,第330页)笑峰大然,俗名倪嘉庆,江苏江宁人,嘉庆进士,后投于曹洞宗高僧觉浪道盛门下,晚年主持本宗开山祖师七祖行思道场青原山净居寺,对青原山及周边掌故熟悉,他对马祖道一在青原山周边活动历史的叙述应该可靠。

综上述考证,据南阳慧忠和青原行思、汾山灵祐和石头希迁、仰山慧寂和耽源应真之间的三对关系,以及南泉普愿的“一二三四五”,则谓仰宗的“方圆”和南泉普愿的“数码”,或即青原行思《周易》象数学之遗风流韵。虽然同为禅宗象数学,汾山灵祐、仰山慧寂和南泉普愿等南岳系诸禅师,未得青原行思禅法真传,故而与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精细绵密的曹洞宗象数学比较起来,洪州宗的象数学则显得粗糙简陋。

(六)药地大智之再证

《周易》象数学非常复杂深奥,非一般人所能掌握。将《周易》象数学与禅学结合起来,更是难上加难。所以,在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之后,青原禅系的《周易》学中断很长时间,直到明末清初药地大智才接续起来,药地大智是明末清初大学者方以智逃禅后的法号。

刘浩洋对药地大智和青原禅法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考察后说:“青原之学向来有禅学和心学两大传统,不过真正使其结出无愧乎当代的学术果实者,一在于觉浪道盛的庄学论述,一在于桐城方氏的象数易学;而青原学风便是这一颗《易》变而《庄》的学术果实中,播扬其‘三教归易’的心志种子。”^⑤周锋利有类似的观点^⑥,可见这是一种普遍看法。

方以智出身于一个士大夫又是四世传《易》的家庭。当时人说:“先生家屡世传《易》。《易》

① 萧汉明《〈周易本义〉导读》,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256页。

②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载《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5册,第2826页。

③ [唐]权德舆《唐故章敬寺百岩大师碑铭并序》,载周绍良《全唐文新编》第3部第1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99—5900页。

④ [宋]释惠洪撰,[日]释廓门贯彻注,张伯伟等点校《注石门文字禅》,第1354—1355页。

⑤ 刘浩洋《从明清之际的青原学风论方以智晚年思想中的遗民心志》,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 参见周锋利《青原学风与方以智晚年思想》,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580—584页。

《易意》《周易时论》《易余》诸书盈尺,类皆发前人所未发。”^①他晚年概括如自己说:“角巾鼓篋,即好旷览而湛思之。长博学治文辞,已好考究,已好物理。已乃读《易》,九闋八埏,无不极也。”^②正因为方以智博学多识且具有深厚的家族易学传统,他才能在青原山重发行思禅学之潜德幽光,其《象环寤记》说:“佛生西,孔生东,老生东而游西,而三姓为一……溯其源同,则归于《易》耳。”^③

药地大智在青原山提出“三教归易”的口号,必对青原行思有所悟解,只是受于时代所限,苦于史料短缺而不能系统证明之。时近千年之后,药地大智在青原山提出“三教归易”的口号,这可证明行思的确曾经阐扬《周易》之学,也佐证青原二字具有易学色彩,早期禅宗曾经有一股以《周易》为基础融会儒道释三教的运动。

结语

由于史料的散佚,禅宗七祖青原行思的生平业绩长期隐晦不彰。但多种资料表明,青原行思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高僧,开启了一场影响极为深远的以《周易》为基础圆融儒道佛三教的禅宗革命运动。本文通过对行思驻锡山名的演变和“青原”意蕴进行考辨,证明青原行思具有深厚的易学造诣,进而将禅易关系的肇始从云岩昙晟提前到青原行思,揭示淹没于历史长河中初期青原禅系与《周易》的关系,不仅可以为研究早期禅宗的发生打开新局面,也可以为研究魏晋隋唐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责任编辑:张文智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 and *Yijing* was mostly traced back to the *Maojing sanmei* (Mirrors of Samadhi) written by Yunyan Tancheng (781-841), who wa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successor of the Seventh Patriarch of Zen Xingsi (671-740). In fact,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Zen and *Yijing* can date back to Xingsi in that various resources have shown that Xingsi was the first monk who bridged Zen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name of the Qingyuan hill, in which Xingsi transmitted Dharma and live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its name changed from Anyin (lit. seclusion in quietude) to Qingyuan (Spring hill) in his time, which has a profound background of *Changes* scholarship and helps to reveal the preliminary Zen-Yi relation overwhelmed in history. Not only could this discovery open new avenues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ly Zen, but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from the Wei (220-265) to the Tang (618-907) dynasties.

Key words: Qingyuan Xingsi; *Zhouyi*; the name of Qingyuan hi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 and *Yijing*

① 侯外庐《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载[明]方以智著,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页。

② 侯外庐《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方以智全书前言》,载[明]方以智著,侯外庐主编《方以智全书》第一册上,第9页。

③ 转引自彭战果《无执与圆融——方以智三教会通观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54页。